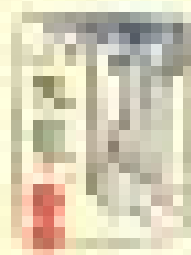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祝勇·主编

朱正

古吴轩出版社



朱正

祝勇 主編

大家



朱正

古吳軒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朱正/朱正著. —苏州: 古吴轩出版社, 2004.8

(大家文丛)

ISBN 7-80574-855-1

I. 朱… II. 朱… III. 鲁迅 (1881~1936) —人物研究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85413号

主 编: 祝 勇

编 委: 鄂 力 戴 彤 谭宗远

策 划: 施曙华

责任编辑: 洪 芳

装帧设计: 周 晨

责任校对: 武国丽 颜 丹

权俊良 李代玉

书 名: 朱 正

著 者: 朱 正
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: 215006

E-mail: gwxcbs@126.com

电话: 0512-65232286 传真: 0512-65233679

印 刷: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20×960 1/16

印 张: 12.25 插 页: 1

版 次: 2004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574-855-1/G · 230

定 价: 1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序

祝 勇

这套书的编辑完全出于一次偶然的闪念。平时不去想它，是因为它看上去不可能，只有两类人富于天真的异想，而从来不计工本——皇帝，和孩子。我有些不自量力，但这个想法令我兴奋。从苏州刚刚回到北京家里，老施一个电话追来，我们都已情不自禁，沉浸在工作状态中。

最初的想法是从老一代学人艺术家开始的。他们活得真是安静，年轻人学不来。杨宪益先生的口头语：“有什么大不了的。”天大的事情，他都要以这句话做总结。写作出版，功名利禄，真的是件小事。他们不愿张罗。旧作断版，不再重印；新作写成，往抽屉里一扔，了事。报纸编辑来约稿，就随手把原稿给他们。杨先生写作从来不留底稿，编他的书，有点像在考古。

是举个例子。别人的状况大抵如此。我是天生的好事者。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想编一套规模大一点的书，囊括老人们的作品，不为他们，为读者——至少，为我自己吧。老人的东西，学不来，但至少应该知道，有这样一批人，这样的想法。像车前子写张仃先生：“他们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，最有热血和最有理想的一代人，也是最受磨难的一代。国家，艺术，在老人的心目中，像吃饭时拿在手上的一双筷子一样自然。”他们将告诉我们什么呢？

几个月中，我卷入所有的编辑事务中。有的老人为我提供了他以前从未刊过的作品，有的则把全部未结集的新作交到我的手上。纸张、信件、照片、电子邮件、电话、复印、核对、编目，翻来覆去，颠三倒四，一塌糊涂。我为此感到荣耀。仿佛目睹了一场下了一百年的雪，一片一片，满满的将我覆盖。

书稿的内容，从一开始就确定为主题性的，至少要展现一位作者最熟悉的方面。又觉得，中年人、年轻人也可以收入。年龄不是标准，境界才是。一卷卷编下去，卷帙浩繁，像一次编辑的远行，或者说，一次大规模的“扫荡”。那样，不就是一部二十世纪（甚至二十一世纪）的文化史吗？我不敢想。一点点做就是了。一个富于野心的编者，遇到一家富于野心的出版社，事情就弄成这样。

这个项目可能持续若干年，将分辑陆续推出。我们的工作需从每一张纸片开始，循着字迹的线索，潜入那庞大的、无边的世界中去。

2004年7月

目 录

大
家
文
丛



朱
正

- 前记 1
- 回忆文的可信程度 3
- “木瓜”其人其事 7
- “政客”这顶帽子 14
- 小人张凤举 20
- 鲁迅死因“正、反、合” 24
- 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……”(上)1946 年的答案… 30
- 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……”(下)1957 年的答案… 47
-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 64

· 关于救国会的解散	82
· 删掉的信息	85
· 新发现的一封鲁迅书信	90
· 贵在新见——读王福湘著《悲壮的历程》	92
· 回忆林辰先生	97
· 这叫“审读”吗？	99
· 野史的记载与正史的记载	117
· 公式的缺陷	119
· 都是偏见	127
· 胡适当大使	131
· 胡适和他的右派儿子	137
· 在场者的见证	144
· 君子和而不同	148
· 士可杀不可辱	154
· 赦免麻雀的“说法”	161
· 朱自清的一句诗	167
· 陈琼芝著《生命之华》序	169
· 飞椽蘸海愧虚褒	176

前 记

很意外的,又得到了一个出书的机会。祝勇先生主编“大家文丛”,承他不弃,邀我参加,于是我就把近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翻了出来,剪贴复印,编出了这样一本。

我出版第一本书《鲁迅传略》,至今快有五十年了。那本小册子使我得到了一个“鲁迅研究者”的虚名。在以后的几十年里,这也确是我经常关心的题目,陆陆续续写了好些长长短短的文章,2001年我还把这些文章编成了《鲁迅论集》一书。

鲁迅也真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。他的作品: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诗,有从社会学、历史学研究的,有从美学、文艺学研究的;他的生平,包括他同一些政治组织的关系,他同一些人的交往,乃至他的家庭和婚姻生活等等,都不断有人在做新的研究,不时有新的成果发表。也还偶有新的文献和新的史料出现。像周海婴2001年出版的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一书,其中提出了鲁迅死因问题,提出了“假如鲁迅活着”的问题,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一时成了“热门话题”,不少论者发表了文章,各抒己见。

针对一些我不很赞同的论点,我写了这几篇,算是参加讨论。发表之前和之后,曾经请几位朋友看过,承他们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见,我都照改了,这样就比初稿有了一点改善。我很感谢。

这些文章总字数不足十万,没有达到丛书体例的要求。我又

不想把已经编入别的集子里的文字抽过来凑数,就把关于巴金和聂绀弩的一万多字编到这一起了。这两位都同鲁迅有友谊,也都在鲁迅以后的文坛上有很重要的表现。把这两篇置于本书之中,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希望读者认可我这样的编辑方法。

2004年5月12日 朱正于北京

回忆文的可信程度

看到艾以先生的《沈尹默写〈忆鲁迅〉》(载 2001 年 10 月 6 日《文汇报》)一文,就想到了这个题目。

沈尹默的这篇不长,不足千字,写的大都是一些印象,没有什么微言大义。(见《鲁迅回忆录》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,散篇,上册第 245—246 页)可以说是“记事”的只有两件事:一是在窗纸上见到一只驯养的壁虎,一是鲁迅和周建人曾经请他吃过一顿饭,都是日常琐事,即使记述有一点出入,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就说请吃饭这事,沈文说是他 1932 年移居上海以后的事,而鲁迅日记中的记载,却在 1928 年 8 月 4 日,而且东道主是李小峰,他们都是被邀请的客人。沈尹默没有记错的是,那天确实周建人、许广平都去了。这样的琐事,记错一点,并没有关系。

后来,沈尹默还写过一篇《鲁迅生活中的一节》,登在 1956 年 10 月号的上海《文艺月报》上,近三千字。(见同上书,第 247—250 页)其中谈到一些大一点的事,有另外的材料可以参看,因而也就能提出它可信程度的问题来了。

一件事,沈文说:“新青年杂志由独秀带到北京之后,有一时期,曾交由鲁迅兄弟、玄同、胡适和我分期担任编辑,我是长期病眼的人,不宜而且不善于做编校工作,因此,凡轮到我编辑的一期,总是交给玄同、半农去代办。”

《新青年》杂志分期编辑的事，在该刊第六卷第一号（1919年1月15日）目录后面一页刊出了一则《本杂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》：“第一期陈独秀，第二期钱玄同，第三期高一涵，第四期胡适，第五期李大钊，第六期沈尹默。”鲁迅周作人兄弟不在这名单之中。陈独秀在1937年写的《我对于鲁迅之认识》一文中说：“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，都是《新青年》作者之一人，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。”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看法，也就没有请他们两位担任分期的编辑了。

这里还有一点旁证。鲁迅在《忆刘半农君》一文中说：“《新青年》每出一期，就开一次编辑会，商定下一期的稿件。”接着说了他在会上对陈独秀和胡适的印象。可是，周作人1958年1月2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，“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，紧张，有时戏剧性的，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，即是失实——多有歌德自传《诗与真实》中之诗的成分。例如《新青年》编辑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，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。每人担任一期，我们均不在内。会议可能是有的，我们是‘客卿’的地位，向不参加的。”（见钟叔河编《周作人文类编》第十册《八十心情》第239页。）

另一件事，沈文接着说：“那时新旧文学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，玄同、半农最为起劲，以林琴南为放矢之的；半农曾化名为‘王敬轩’和玄同串演了一次轰动一时的双簧，不料触怒了‘胡博士’，他提出了抗议，认为这种有失士大夫身份，‘不登大雅之堂’的文章，不应该发表，并且极力主张把这个杂志收归他一个人去编辑，不许半农与闻。鲁迅是支持玄同和半农的，听见了‘胡博士’的话，马上斩钉截铁地告诉他：这个杂志如果归你一手包办，我们就坚决不投稿。这样一来，‘胡博士’便知难而退了。”

接触过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沈文把这一出双簧的两个角色写反了。以“王敬轩”这个假名字写信，提供一个批判的靶子的，是钱玄同。刘半农是批判的一方。沈文说，对于这事，有胡适提出抗议，认为有失士大夫身份。就我看到的材料来说，对这事有意见的，并不只胡适一人。周作人的《饭后随笔》中有一篇《王敬轩》，其中说：

刘那时正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，接到这封怪信，自然又气又笑，拿起笔来——加以批驳，一口气写上万把字，年少气盛，笔写得滑了，有些地方很不客气，虽然说痛快也是痛快。这封信发表了之后，反响不很好，大家觉得王敬轩有点可怜相，刘半农未免太凶狠了。其实这是难怪的，因为王敬轩并非别人，实在就是钱玄同，他和半农商量，这样的串一下双簧，彼此用不着什么顾虑；假如真是来信，回答也就不能那么率直了，但是这通信的影响不很好总是实在的，编者也自承认。

周作人的另一篇文章也说这事：“那篇回答是刘半农所写，火气很盛，当时同人中也有不大以为然的……半农的回答欠庄重，多少减了些力量。”（见《八十心情》第463页）

还不是只周作人一人这样说，罗家伦在口述遗稿《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》中说：“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一封复信，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一顿。这封信措辞轻薄，惹引了不少的反感。后来新青年社中人，亦甚感懊丧。”（原载台湾《传记文学》第54卷第5期，《鲁迅研究月刊》1990年第5期转载）

在社中表示懊丧、不以为然的人中，无疑包括胡适在内。也许

他是话讲得多一点、激烈一点的一个。沈文把鲁迅摆在胡适的对立面,说在这些事情上,“鲁迅是支持玄同和半农的”。我没有见到过鲁迅在当时写了什么表示支持的文字,倒是在他十多年之后写的《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》一文中,看到了这样的意见:

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“论争”;倘在诗人,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,而笑骂,自然也无不可。但必须止于嘲笑,止于热骂,而且要“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”,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,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,观者也不以为污秽,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。

推想起来,鲁迅未必会支持那措辞轻薄的批评吧。在《忆刘半农君》一文中,鲁迅说他,“有时颇近于草率,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”,“倘若失了算,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”。这些话所指的,不知道是不是也包括双簧信一事在内。

沈尹默是新青年同人,应该是了解情况的,可是他的回忆文章,也有不能尽信的地方。我想,不久以前在学术界刚刚进行了一场批判胡适思想的大运动,所以沈尹默才这样写的吧。多年之后再读这一篇,就不一定会注意到写作时候的这些背景了。读书不能轻信,这不过是又一例。

2001年11月3日《文汇读书周报》

“木瓜”其人其事

鲁迅 1910 年 12 月 21 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说,“木瓜之役,倏忽匝岁”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

许寿裳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中说了一个大概。1909 年,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课,“到了冬天,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,原因由于监督易人:衡山先生(引者按:即沈钧儒)被选为咨议局副议长了,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,我们名之曰‘夏木瓜’。到校的一天,他要我陪同谒圣,我拒绝了,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,恕不奉陪。他很不高兴,我也如此。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,仅仅差送一张名片,并不亲自拜会,教员们大哗,立刻集会于会议厅,请他出席,他还要摆臭架子,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。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,即向旧监督辞职,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,鲁迅便是其中之一。教员计有朱希祖,夏丐尊,章铤,张宗祥,钱家治,张邦华,冯祖荀,胡浚济,杨乃康,沈朗斋……统统搬出了校舍,表示决绝。夏震武来信骂我是‘离经叛道,非圣侮法’,简直是要砍头的罪名;我便报以‘理学欺人,大言诬实’。使得他只好勉强辞职,我们便回校,回校后开了一个‘木瓜纪念会’。”

马叙伦《石屋续渚》中也有“夏震武”一节:

夏灵峰先生震武,字伯定,号涤庵,浙江富阳县里山

人。以进士官工部主事，治理学，宗程朱，而实私淑晦庵。母歿，葬杭州西湖之灵峰，遂又号灵峰。先生庐墓三年，巡抚尝使致劳，睹芒鞋竹笠者不知即先生也，不为礼，先生因亦不语以姓名知仁和、钱塘两县事者，以时候起居，夏孝子之名遂播于人口。服阙，赴曹，及甲午之役，劾李鸿章误国，不报，遂归田。至清末，刘廷琛为京师大学堂监督，聘为教员，先生以师道自居，朔望谒拜孔子，必先监督。某年，先生年假还里，过杭州，寓望仙桥堍旅馆，使招余往，率然问曰：君看汤蛰仙为何如人？蛰仙，汤先生寿潜字也。时蛰丈方办沪杭甬铁路，有盛名。余知先生言必有谓，不敢遽对。先生曰：蛰先，伪君子也。余唯唯而已。辛亥后，先生里居不复出。余往候之，先生束发冠儒冠，衣深衣，俨然如对古人。余宿其宅，内外不闻语声。先生有弟则剪发矣。设米店于江边，弟司其业。然闻里山人云：买卖升斗出入不同，未知如何。余荷先生青目，昔时皮藏其所遗书牋，经渐当付阙如矣。

清亡之后，夏震武要当遗老，不做民国的官，怎么营生呢？他是开了一爿米店，由他弟弟经营。据当地人说，他做生意可不大规矩，大斗进，小斗出，不讲商业道德。用道学家的话说，就是欺心。这也印证了一句古老的名言：“黄金无假，道学无真。”说起假道学，还可以举一小例。不是说他是个庐墓三年的著名孝子吗？当年和鲁迅同在两级师范任教的杨莘耜，也是“木瓜之役”的参加者，在《六十年间师友的回忆》一文中也说起了这件事：

其时两级师范教职员中留日学生约占十之八九，短衣无辫。在夏震武看起来，这些人都是乱党，都是革命

党,我们对夏亦看不顺眼,说他是个老顽固,说他是个假孝子(传说他在母死后庐墓三年中生有一子的事情,这种争论,在现在看来,也是很可笑的)。(见《鲁迅回忆录》散篇上册,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)

刘福姚的《庚子纪闻》也说到了这位夏震武。庚子那年,刘是浙江乡试主考。他也是个顽固派。就在这篇《庚子纪闻》里说康有为“实荒谬妄诞人也,与其徒梁启超喜言变法,将举中国而夷之。”他引夏震武为同调。八国联军攻占北京,慈禧光绪逃到西安。“诏求贤才,各省不闻有举者。余保荐数人,主事洪嘉与夏震武二人得引见。二人皆敢言,然当路不愿闻之,屡加申饬焉。”(见《义和团史料》上册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)夏震武是怎样的“敢言”,又受到怎样的“申饬”呢?

关于这件事,龙顾山人(郭则沅)在《庚子诗鉴补》中有一诗咏他:

新旧才人貉一丘,虚名误尽过江流。

请看十六中兴策,此土獐头亦虎头。

诗后的解说:

同光以来,朝贵宏奖虚声,竞侈谈时务,以弋名干进。甲申、甲午两役,误于此辈者为多。至是两宫西狩,慨念时艰,颇有乏材之叹,适工部主事夏震武,自里居奔赴行在,上中兴十六策。枢臣鹿文端(引者按:新任军机大臣鹿传霖)伟之,荐于上,命入对。夏自请使俄,争东三省和约,且举洪嘉与许珏为助。两朝不许,仅命赴北京参与和议。夏大失望,因具疏请斩王文勤(引者按:军机大臣王文韶),目为汉奸。朝旨责其狂妄,拟遣戍。鹿力为营